

未刊稿，请勿直接引用

## 第一章 苏联文化管理体制与行政干预机制

苏联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管理体系分为国家和党的两个系统，首先表现为完备的和独立的国家系统，但最终权力却归结到党手中。当代俄罗斯学者日德科夫认为：“苏联的文化政策在于，这是目的在于形成关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建立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之上的文化（艺术）生活的应有状况的一系列概念的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动。确定优先的目的和文化倾向、限制、禁止，或者相反，以不同的方式和表现（思想的、道德的、物质的和财政的，等等）支持某种倾向、某个创作集体、某些文化代表人物、某种文化活动和创作，使其与官方的指示相协调和不冲突。”<sup>①</sup>这一体制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引导着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艺术创作的方向，繁荣了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发挥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体制是斯大林模式内在的需求，是以高度集中为核心本质的，因而制约了上述领域的长远发展，也制约了苏联人民的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

### 第一节 苏维埃政权早期文化管理机构

#### 一、文化管理体制初建

1919年3月5日是苏联党的机构建立的重要日子。届时从俄共（布）中央选举出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列宁把它看成是党和其他所有领域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为了开展工作又建立了组织部（Оргбюро）和书记处（Секретариат）。在上述会议上讨论和通过重要决议以及干部任命和机构改组决定。1920年在中央委员会组成中建立了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从事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策略和政策的制定。宣传鼓动部由于其作用不同经历如下调整时期：1920-1924，1924-1928，1929-1933，1934-1935，1935-1939，1939-1947，等等。1935-1939年的宣传鼓动部的分支机构最多，当时其职能分别由5个独立机构履行：党的宣传鼓动部，出版物与出版社部，文化教育工作部，科学部，学校部。……联共（布）中央机构调整到1939年基本完成，意识形态职能完全集中于中央政治宣传管理部（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литагитации-УПА）

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а）作为苏联共产党机关最重要的构建立在1920年4月。当时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的形势变得明显了：即国内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军事共产主义不能保证苏维埃党——国家制度协调职能。向政治领域的公民世界转变和向国民经济领域的新经济政策转变需要意识形态工作、大众信息、文化和艺术管理方面的高质量的变革。新的管理宣传鼓动体系被称为“宣传鼓动机”（агитпроп），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成为其大脑核心。<sup>②</sup>

关于对艺术生活和创作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方式和程度问题在俄共（布）党内曾经引发激烈争论。1927年，来自极左方面批评意见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艺术领域缺乏清晰的政策。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剧院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主任布留姆（В.Блюм）举例子，说明莫斯科模范剧院经受着来自党的官员的折磨。卢那察尔斯基予以回应：“艺术领域的国家政策完全不应该特别严厉，因为对艺术会走到相反一面对于所有居民来说变成公开的仇视艺术。”他抱怨缺乏物质资料，即按他的观点，其主要是缺乏明显表述的党的作用和面向全国的政策，因此出现了就党的文化政策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能的个别观点的个人解释的现象。他认为当前艺术的特点是“处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外的特殊性和分散性状态（文学脱离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处于其他中心管理之中”。<sup>③</sup>

从原则上讲，党和国家领导的建立作为一个系统反映着国家政权所确定的类型和性质。作为

<sup>①</sup>Жидков В.С.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театр. М., ИздАТ, 1995. С. 4-15.

<sup>②</sup>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19.

<sup>③</sup>ГА РФ. Ф. А-2306. Оп. 69. Д. 843. Л. 4-57.

综合系统和苏维埃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两个基本发展时期：初立和确立时期，停滞时期。与此相联系就划分出两个基本历史路标：1917年至1930年代，1940年代至1991年。……这两个时代的编年史界限是1930至1940年代，直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苏联参与军事活动相关联。10年的界限特别之处在于其过渡现象和惯性趋势，因此导致不可能确定一个准确的年份。但是客观上形成的国际局势导致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从20年代末起到30年代末形成了具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类型的军事工业国家。苏联与法西斯德国同时进行着加速战争准备，这种准备反映在国家机构改革、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最终垄断意识形态、建立军事工业综合体以及播种引发大规模镇压的恐惧和狂热的种子之中。正是到30年代末党和国家管理体系完备形成，调整了决策采纳机制和导致在几周内改变方向、组织和动员国家大部分居民的政治运动。在建立的集中和包罗万象的体制的帮助下，极端集中的权力控制工业生产组织、教育和艺术的所有领域。<sup>①</sup>

苏联学者柯日辛娜（Т.П.Коржихина）认为20年代初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政治斗争背景下的错误决定是行政管理体制（АКСУ）产生的原因，因此政权最初是被一部分人，而后是被一个人在低层的普遍的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霸占。<sup>②</sup>

这种行政管理体制在所有时期的特点是：1、苏维埃权力被削弱，它的官僚化和脱离真实权力，人民民主的口号被废弃。2、做为管理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方法是原则、方法和建立在大清洗、司法和非司法的强制基础之上的管理方法之和。3、扩大国家机关并且将其与党的机构合二为一，该党具有国家化的特殊标志、在全联邦（全联盟）的国家和党的机构中过分的权力集中化和浓缩，最终以党的权力代替了苏维埃和国家的权力。4、1923年末实行的特权阶层（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是轴的主干，依赖其上的是党的机关选定的管理干部的个人利益和不负责任。……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成为将自己的痕迹遍及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的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一定的标志，在当前的环境下推行恐怖和怀疑。<sup>③</sup>

根据1925年党对文学的决议存在着“来自于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营的反对派艺术”。<sup>④</sup>

1928年3月16日，电影导演亚历山大（Г.Александр）、柯津采夫（Г.Козинцев）、特拉别格（Л.Трауберг）、波波夫（А.Попов）、普多夫金（В.Пудовкин）、罗姆（М.Ромм）、爱森斯坦（С.Эйзенштейн）和尤特克维奇（С.Юткевич）给联共（布）党的电影事务会议写信提出在电影领域缺乏意识形态领导并且必须建立制定电影工作生产计划的权威机构。<sup>⑤</sup>“无产阶级文化协会”（ВАПП）领导人阿维巴赫（Л.Авербах）高度评价了电影导演们的行动，认为它代表了导演群体主动将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与艺术领域的无产阶级路线紧密结合在一起。<sup>⑥</sup>

最初是为了保护革命成果而建立的特别机构肃反委员会（ВЧК）、国家安全总局（ГПУ）、内务人民委员会（НКВД）是管理体系的最重要因素，后来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镇压机构。

1921年国家保卫总局（ГПУ）特别全权代表阿格拉诺夫（Я.С.Агранов）给国家安全总局主席捷尔仁斯基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维埃团体》反映了格柏乌在与国内思想界敌人斗争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在报告中谈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联合的危险性：“反苏知识分子广泛地利用其公开建立组织和联合自己力量的可能性，对苏维埃政权发起和平攻势并且削弱镇压机关的工作。”他认为最大的危险在于，建立学术、经济和宗教领域的创作和自由团体和组织，它“将事实上进行反革命斗争，高等学校、各种协会、出版物、各

<sup>①</sup> 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5.

<sup>②</sup> Коржихина Т.П.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ноябрь 1917 г.—декабрь 1991 г. М., РГГУ, 1994. С. 17-28.

<sup>③</sup> 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6-7.

<sup>④</sup> ГА РФ. Ф. А-2306. Оп. 69. Д. 843. Л. 4-57.

<sup>⑤</sup> ГА РФ. Р-5446. Оп. 31. Д. 80. Л. 23-24.

<sup>⑥</sup> ГА РФ. Р-5446. Оп. 31. Д. 80. Л. 26.

种地方代表会议、剧院、合作社、托拉斯、贸易机构和教会成为斗争的战场。”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存在着两大基本的“反苏”倾向。其是争取高等学校“自治”，其二是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经济状况。尤其是争取“自治”活动是明显的反对党在高等学校路线和阶级原则的表现。<sup>①</sup>

1922年8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决议《关于不赢利协会和联盟建立和登记程序和监督程序》，其中准备登记的文献由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和国家安全总局共同审查。<sup>②</sup>

格伯乌报告中把私人出版社被看成是“反苏知识分子不会放过利用的强有力的斗争武器”，私人出版社得以将各种反苏组织和人物联合在其周围，从而“用反共产主义文献、教士——神秘主义出版物和各种类型的淫书充斥市场”按照格伯乌的观点，合作社机构是反革命的主要支柱，在那里“共产党员非常少”，而物质力量、宗教势力却强大得多，“高级黑色百人团知识分子，其中即有来自宗教界人士，也有信教的未出家者再度复活并且为建立抗击无神论的阵线准备了土壤。”<sup>③</sup>

1922年10月13日建立了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的反宗教宣传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其成员有来自国家安全总局明仁期斯（В.Р.Менжинский）和宗派事务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сектантским делам）主席斯米多维奇（П.Г.Смидович），该组织的职能是全权“执行宗教政策（与教会团体联系），制定出版、口头宣传和鼓动指示”。<sup>④</sup>该委员会与国家安全总局、中央宣传鼓动部保持经常性的和密切的联系，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联邦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领导“共产主义的国家宣传”。<sup>⑤</sup>

这样从苏维埃初建时期始，在管理和控制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党的权力就高于政府权力，或者党政权力合二为一了。1920年根据国家安全总局的建议，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立常设委员会履行对不同文化部门的意识形态管理。1924年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立专门委员会对电影团体实行政治监督，成员包括希佐夫（Сырцов）、梅希梁科夫（Мещеряков）、雅科夫列娃（Яковлева）和谢纽什金（Сенюшкин）。<sup>⑥</sup>

1922年10月23日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艺术事业委员会”（Главискусство）作为“对俄罗斯联邦艺术生活全面思想领导和管理”的机构。这个问题在俄共（布）党内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数次会议上引起了较大分歧。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我们需要艺术事业委员会吗？》引发了辩论，卡冈（П.И.Коган）、斯维杰尔斯基（А.И.Свидерский）和加勒（Н.Я.Март）参与了辩论，值得一提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否定的一边。最终于1928年4月14日俄罗斯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建立“专门的专门领导文学和艺术的机构”——艺术事业委员会。但是围绕着该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方式问题的争论在1938年前始终没有停止，斯维杰尔斯基（А.И.Свидерский）、拉斯柯里尼科夫（Ф.Ф.Раскольников）、孔恩（Ф.Я.Кон）和阿卡杰夫（М.П.Аркадьев）先后主持该委员会工作。

因此到1928年形成了具有平行管理职能特点的国家机构分工网络。教育人民委员部的职能局（包括造型艺术局、博物馆艺术局、技术艺术局等）是这个网络的基本链条，此外还有文学艺术事业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艺术事业委员会、剧目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Главполитпросвет）和国家出版社管理总局（Госиздата）。如此庞大的专门机构的设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重叠、效率低下的现象，尤其是在行使监督职能的三大机构——文学艺术事业管理总局、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与艺术事业委员会之间。1926年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通过专门决议《承认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不做为部门间机构，而作为教育人民委员部

<sup>①</sup>РГАСПИ.Ф.17.Оп.86.Д.17.Л.55-58об.

<sup>②</sup>Горяева Т.М.,и др.,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М.,2004.С.9.

<sup>③</sup>РГАСПИ.Ф.17.Оп.86.Д.17.Л.58.

<sup>④</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378.Л.3.

<sup>⑤</sup>ГА РФ.Ф.А-2306.Оп.1.Д.2945.Л.151-152.

<sup>⑥</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567.Л.2-3.

的机构》。此外通过决议将电影审查权力集中到剧目监督总委员会，停止艺术事业委员会的相关职能。1929年1月10日在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专门会议上讨论了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与艺术事业委员会剧院和电影院分会之间的职能的界限问题。1月28日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体负责人通过决议调整对演出企业剧目的监督方案。这个问题同时上报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组织部通过专门决议《关于交付出版问题的苏维埃机构（出版事业委员会、文学艺术事业管理局和书籍协会等），和该事务与联共（布）中央出版部的组织联系和职能划分》。

因此事情是清楚的，任何的指示和决议都不能消除在文学艺术事业管理总局、剧目监督总委员会和艺术事业委员会——三个相互处于复杂的等级和职能关系之中的总局之间经常出现的混乱。<sup>①</sup>

1933年俄罗斯教育人民委员部改组后，艺术、剧院问题和艺术生活管理最终从其管理职能中脱离。从艺术和文学局中划分出“剧院和演出企业管理局”，由其领导剧院艺术和戏剧院校。新建立了审查音乐和造型艺术作品的部门，其中包括国家音乐爱好者协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филармония）、音乐学院和俄罗斯艺术科学院（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художеств）。剧目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更名为“剧目和演出监督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репертуаром и зрелищами）。苏联人民委员部新设立“电影——摄影工业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ино-ф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ри СНК СССР）取代原来的“电影联盟”（Союзкино）。教育人民委员部只能通过“国家出版联合会”（ОГИЗ）、“剧目和演出监督总局”和“剧院和演出企业管理局”行使对艺术事业的领导职能。1936年1月17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和苏联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建立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ВКИ при СНК СССР）。决议中强调：“由于劳动群众文化水平提高和必需更好地满足居民对于艺术的需求，为了联合所有的管理苏联艺术发展的机构”而设立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СУ СССР.1936.№5.Ст.40.）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НКП РСФСР）向“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转交艺术企业管理和自治共和国艺术管理职能。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也纳入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内。有经验的宣传家、《星》（Звезда）和《真理报》的老编辑、俄罗斯通讯社（РОСТА）创始人克仁采夫（П.М.Керженцев）担任了该委员会首任主席职务。

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管理领域包括：所有艺术门类、电影——摄影工业、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以及艺术团体和组织，各类艺术院校，各类与艺术相关的工厂企业。该委员会还负责对所有剧院的演出剧目、电影、马戏、音乐会、小型文艺演出、录音实施国家审查。此外，它还负责奖惩性的政策的制定，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组织展览会、奥运会、竞赛活动，领导出版业，购买艺术作品，制定艺术演出票价，组织苏联艺术的国外展出。

一些具有私人性质的剧院、出版社、协会、联合会被取消，作家、导演、画家、演员变成国家工作人员，未经允许无权转换工作单位（剧院、协会或音乐团体等）。著名的“缅依耶霍里达国家剧院”（ГОСТИМ）和“室内乐剧院”（Камерный театр）被撤消。这样，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工作范围就剩下教育管理了。

俄国侨民文学史家司徒卢威（Г.П.Струве）<sup>②</sup>著有《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文学：1917-1953》。他将苏联文学史分为7个时期：1917-1921年是转变时期；1921-1924年是革命浪漫主义时期；1924-1929年是新文学出现时期；1929-1932年是文学“穿上制服”时期；1932-1941年是文学消沉时期；1941-1946年是文学为战争服务；1946-1953年是文学执行党的路线时期。<sup>③</sup>

当代俄罗斯学者戈梁耶娃评价：“因此借助建立的庞大的文化和思想管理体系，国家的文化政策得以实行，而这种文化政策是极权主义类型国家在其确立和运作阶段中的社会政治体系的组

<sup>①</sup>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11.

<sup>②</sup> 他是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编辑出版家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的长子。

<sup>③</sup> 司徒卢威：《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文学：1917-1953》//《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薛君智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成部分。”<sup>①</sup>

## 二、宣传鼓动部：苏共文化管理体制的缩影

专门从事苏联文化体制研究的当代俄罗斯学者戈梁采夫评价：“宣传鼓动部一直到1991年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结构的主轴，而且是多民族的苏联国家的主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理解这一点。从狭义方面看，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分支机构。宣传鼓动部本身是中央委员会的分部，名称更替为‘宣传、鼓动和出版部’（АППО）、‘文化和宣传部’（Культпроп）、‘文化-教育工作部’（Культпросвет），宣传鼓动局，宣传部等。它有时是机动的，有时是庞大的、尾大不掉的结构，但永远是看不见的和隐匿于社会的。然而它的最终产品又是有目共睹的，即：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苏维埃文化和形式上是多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艺术。遗憾的是，在多次的调整和合并的表面的背后，被划定的宣传鼓动部不总是能被看清其现实的逻辑性。……国家历史中的巨大运动（工业化、集体化和1937年的大清洗）、宣传鼓动部传记的每一章（战争、“解冻”）的开头都是与其变化相关联的。”<sup>②</sup>

从宣传鼓动部的活动观察其一定的双重性和与其他的国家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管理局（ПУР），20年代的俄罗斯联邦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政治管理总局（Политуправление）和全苏信息管理局（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工作的平行性。在列宁领导革命最初年代，把宣传鼓动看成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和人民群众广泛创作（无产阶级文化派运动），包括红军政治机关活动的优先范围。……一方面，它的职能严格地集中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另一方面，它还被看成是与其他部门（军队、共青团、共产国际、人民委员部政治处、民族共和国宣传部等）平行和双重的机构。”

20年代初宣传鼓动部职能的调整和归属的变化是与斯大林密切相关的。1921年8月22日，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通过决议指示：“由斯大林监督和广泛领导宣传鼓动部”。<sup>③</sup>9月13日政治局再次强调：“责成斯大林将自己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分给党务工作，将不少于1个半小时的时间分给宣传鼓动部”。<sup>④</sup>在斯大林正式被选上总书记岗位前，他不仅实际主持党的工作，而且监督宣传鼓动部的活动。1935年3月10日在政治局决议中特别强调：“监督中央委员会其他部的工作，特别是文化和宣传部门委托给斯大林同志”。<sup>⑤</sup>

戈梁耶娃认为：“宣传鼓动部作为宣传部门逐渐变成了庞大的机构，数百个党的官员在其中工作。它提出相关领域的关键政策问题、监督党的文化政策的实施、充当所宰的客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和艺术家和政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仲裁者的角色。除去特别大的党的工作，对日益扩展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声电影出现、而后是电视）、学术、文化和艺术领域行使极权主义的监督，导致在党和国家机关、社会和创作组织活动之外形成了无限制的平行职能。”<sup>⑥</sup>

1924年4月2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委任普列奥布拉仁斯基（Е.А.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领导宣传鼓动部。同年4月30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撤消“农村、妇女工作部”（Отдел по работе в деревне и по работе среди женщин），其宣传鼓动职能转交宣传鼓动部。同年6月25日，中央委员会听取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组织结构问题并决定设立“少数民族分部”（Отдел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作为进行当前宣传鼓动的分部”。中央书记处为领导所有的党的宣传鼓动活动决定“建立由内行的党的同志，即女工部主任和农村部主任、中央委员会青年联合会（ЦК Союза молодежи）、重组的领导当前宣传鼓动的部组成的宣传鼓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置于中央委员会书

<sup>①</sup>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13.)

<sup>②</sup>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19.

<sup>③</sup>РГАСПИ. Ф. !7. Оп. 112. Д. 200. Л. 28.

<sup>④</sup>РГАСПИ. Ф. !7. Оп. 3. Д. 201. Л. 3.

<sup>⑤</sup>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ы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95. С. 143.

<sup>⑥</sup>Горяева Т.М., и др.,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хемы. М., 2004. С. 21.

记主席领导之下。领导当前宣传鼓动的（宣传鼓动）部主任应该是该委员会秘书。”<sup>①</sup>

1920年8月宣传鼓动部真正开始工作，下分为4个分部：党校分部（Подотдел партийных школ）、书面宣传分部（Подотдел письменной агитации）、出版分部（Подотдел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和少数民族分部（Подотдел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1920年8月2日又增设了“党的文献分配分部”（Подотдел п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ю партий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20年10月，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为10人。

俄共（布）中央的第9次和10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组织汇报中说明：“宣传鼓动部从1920年8月设立。内分为：1、鼓动分部（Подотдел пропаганды）。2、宣传分部（Подотдел агитации）。3、编辑出版分部（Подотдел редак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4、少数民族分部。5、党的文献分配分部。……在中央委员会之下11个民族局，其中有两个大的局：从少数民族分部分出来的‘突厥民族宣传鼓动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одов）和‘犹太组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еврейской секции）。除此外有波兰局（Польбюро）、德国组、南斯拉夫组、匈牙利组、拉脱维亚组、立陶宛组、爱沙尼亚组中央委员会（ЦК Немецкой секции、Юго-Славянских секций Венгерских секций Латсекции Литесекции Эсетсекции）、捷克斯洛伐克局（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е бюро）和马累共产党员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Мари）”。<sup>②</sup>

1921年5月30日俄共（布）中央组织部重申建立附属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宣传鼓动委员会，宣传鼓动部主席Р.П.Катанян、Л.С.Сосновский和В.И.Соловьев与分部主任为其人员构成。

1921年11月18日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再次听取关于“宣传鼓动部构成”问题。通过决议建立附属于宣传鼓动部的委员会，其人员构成包括斯大林、宣传鼓动部主任和副主任、宣传鼓动部分部主任、俄罗斯通讯社责任领导人和宣传鼓动部责任指导员。

1921年11月27日的会议确立了宣传鼓动部的地位，即“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是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组成部分，是俄共（布）中央组织、联合和领导俄共所有的口头的和书面的宣传鼓动工作。”

其分部为：宣传分部、鼓动分部、出版分部和少数民族部分。

鼓动分部的任务是“广泛地领导党的地方机构的政治和生产宣传工作，行使党对相关的、苏维埃的、职业的机关的宣传工作的监督，研究地方党组织的宣传的方法、方式和样式，探究宣传技术问题。”

宣传分部的任务是从事俄共（布）内部所有的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的研究，从事党在地方宣传工作经验的考核和分类，研究新的宣传方式和方法，研究党对宣传部门工作的监督。

出版分部的任务是领导外省出版的领导，行使党对俄罗斯通讯社活动的监督，深入研究宣传鼓动领域的新闻任务，并且使新闻工作适应党的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工作。

少数民族分部的任务是“协调和领导党在居住在本民族自治州或加盟共和国之外、或者完全不在俄罗斯联邦边界之外的少数民族居民中的民族语言的宣传鼓动工作”。<sup>③</sup>

1921年11月28日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决定确认宣传鼓动部的人员数为106人，其中包括《宣传鼓动通报》（Вестник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ы）和《俄共（布）中央消息报》（Известие ЦК РКП(б)）编辑部，以及民族组（包括波兰局）。<sup>④</sup>1921年12月16日建立宣传鼓动部属下的“鞑鞑——巴什基尔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Татаро-Башкирское бюро）

在俄共（布）中央提交俄共（布）11大的报告中确定了“所有的宣传鼓动部属下的民族组中央局的活动都集中到中央宣传鼓动部少数民族分部。”<sup>⑤</sup>

<sup>①</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43.Л.2,3.

<sup>②</sup>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Март 1921 года.Стер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М.,1963.С.810.

<sup>③</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250.Л.8.

<sup>④</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251.Л.2об.,25-28.

<sup>⑤</sup>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Март –апрель 1922 года.Стер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М.,1961.С.659.

1922年7月28日中央委员会党的文献分配部从宣传鼓动部出版分部中划分出独立的“图书馆和文献供应分部”（Подотдел библиотек и снабж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ой）。

1923年6月8日宣传鼓动部人员增加7人，总数为113人。

1924年2月4日宣传鼓动部出版分部被调整为俄共（布）中央直属的独立机构“出版部”（Отдел печати ЦК РКП(б)）。

由于频繁的机构调整，到1924年3月，宣传鼓动部人员剩下86人。1924年4月11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继续压缩宣传鼓动部的24个在编单位，即压缩到28%。<sup>①</sup>1925年1月9日宣传鼓动部的编制确定为78人（45个责任工作人员和33个技术工作人员。<sup>②</sup>到1926年9月，宣传鼓动部的编制为77人（43个责任工作人员和34个技术工作人员），下设：宣传分部，鼓动分部，地方经验整理分部（Подотдел учета местного опыта），文献分配分部，少数民族分部（马累、楚瓦什、马尔多瓦、波兰、犹太、鞑靼——巴什基尔、拉脱维亚、日耳曼、爱沙尼亚组）。<sup>③</sup>

戈良耶夫评价：“1920年至1952年的宣传鼓动部历史分期与苏联国家历史的最重要阶段相伴随的。1924年2月列宁去世后一下子就建立了出版部（目的？出列宁全集？）。‘宣传、鼓动和出版部’建立于1928年5月的与布哈林集体斗争之前和工业化之初。农业‘大转变’反映在宣传鼓动部新的名称上，1930年1月改称‘宣传和群众运动部’（Отдел Агитации и массовых кампаний）1934年4月至1935年5月改称‘列宁主义文化和宣传部’（Отдел культуры и пропаганды ленинизм）。它的急剧调整完全是由于国家形势的急剧变化。基洛夫被害和大清洗开始导致将文化宣传部（Культпроп）划分为5个分部，从出版物、出版社、学校、科学机构和文化领域中能够看到巨大的干部调整，即宣传鼓动部自身的巨大分割。接下来的调整阶段开始于是不是38年11月至1939年2月。临近的战争威胁条件下的权力集中的新任务导致宣传鼓动部清洗的最终结果。1947年在冷战开端的条件下文化宣传部（Культпроп）进行了战后的调整。这个分期表明，所有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运动缺少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后方的配合是无法进行的。”<sup>④</sup>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以后，苏联集中全部精力忙于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稍有松缓，亚历山大洛夫（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领导的中央宣传鼓动局此时的所有活动就是根据斯大林的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来组织和管理反法西斯宣传工作。当1943年苏联逐渐掌握了反法西斯战场的战略主动权后，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又逐年变得严苛，中央宣传鼓动局也终于能够抽出精力来进行意识形态清理和批判。<sup>⑤</sup>到了苏美冷战拉开序幕以后，苏联国内掀起了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А.А.日丹诺夫操刀的针对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在各个领域、各级党政机关开展意识形态揭发和批判运动，运动的高潮在斯大林去世前达到顶峰。这是二战期间到二战后苏联意识形态政策发展的总体脉络，这一时期在联共（布）中央统筹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这一重任的，除了斯大林本人外，先后有А.А.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等人。

上文对中央宣传部的沿革历史已有提及，在探寻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宣传鼓动机关沿革时，应该先对宣传鼓动局的组织结构进行梳理。

1939年8月改组成立的宣传鼓动局编制定额为144人，其中工作人员114人，技术人员29人。设有局长1人，始任局长是日丹诺夫，1940年9月起由副局长亚历山大洛夫接任。局长助理1人，副局长4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归宣传鼓动局局长直接领导的并不仅仅限于宣传鼓动局本身，还有不在宣传鼓动局框架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Институт Маркса-Энгельса-Ленина），最高党校（Высшая партийная школа）和《布尔什维克》杂志（Журнал

<sup>①</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530.Л.8,131.

<sup>②</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627.Л.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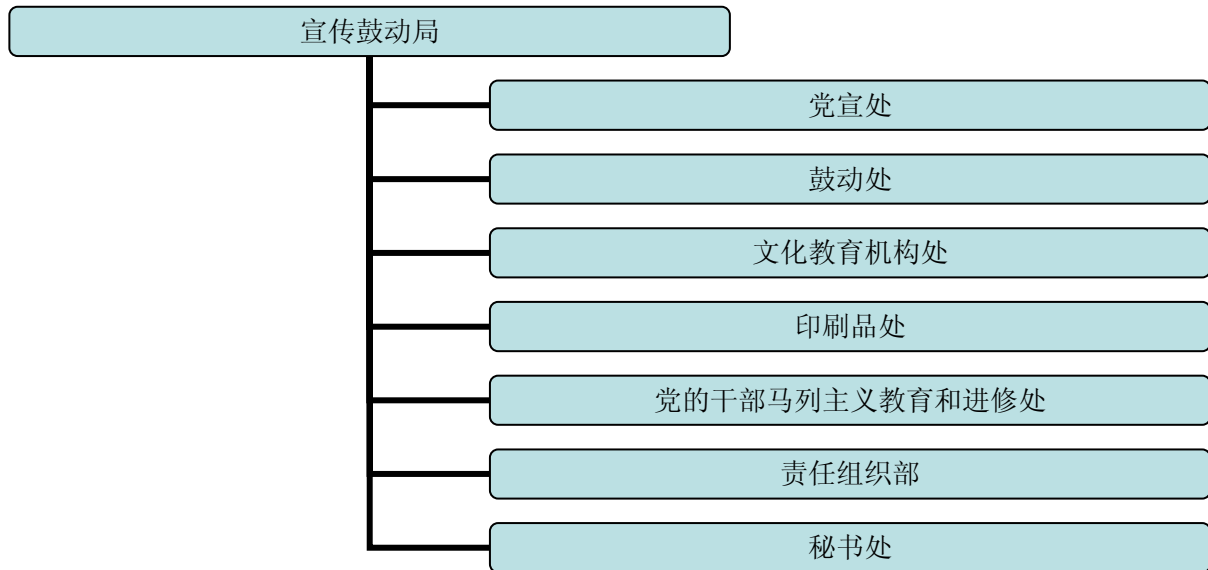
<sup>③</sup>РГАСПИ.Ф.17.Оп.113.Д.210.Л.139-145；РГАСПИ.Ф.17.Оп.113.Д.62.

<sup>④</sup>Горяева Т.М.,и др.,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М.,2004.С.19-20.

<sup>⑤</sup> 苏联逐渐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与宣传的具体措施可参见沈志华、于沛等主编的《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书中记载了从1943年到1945年联共（布）中央发布的诸多要求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在这些决议联共（布）中央指出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宣传鼓动工作是非常落后的。

«Большевик»»。

宣传鼓动局的组织结构如下表可见：



依表可见，宣传鼓动局共设有 7 个下属部门，分割进行相应领域的具体工作。

其中党宣处编制有 30 人，具体职能是在中央和地方领导口头与书面宣传马列主义工作，搜集并总结优秀宣传工作者的经验，将党的宣传工作者联合起来，对高校中的关于马列主义的相关著作内容进行审核。党宣处下设有演讲团（Лекторская группа）、书面和口头宣传马列主义科（Сектор печатной и уст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和高校马列主义宣传科（Сектор пропаганды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в вузах）分管三个领域的宣传工作。

鼓动处编制有 9 个工作人员。它的职能是组织进行群众政治鼓动运动，监察各级党组织的鼓动工作，对群众政治鼓动书籍的出版进行审查。处于鼓动处领导下的组织和个人有：时事政治和国际形势报告团（Группа докладчиков по вопросам текущей полит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书面和口头宣传指导员与顾问团体（Инструкторы и консультанты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ечатной и уст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以及鼓动书籍出版副处长助理（Помощник зав. отделом по изданию агита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和《鼓动者之友》杂志（Журнал «спутник агитатора»）。

文化教育机构处编制有 12 人。它的职能主要是对全苏广播协会（Всесоюзный Радиокomitee）、全苏电影事业委员会（Всесоюзный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人民教育委员会（Наркомпрос）和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ВЦСПС）的政治教育机关工作进行监察。它还对受其监督的如上文艺团体所含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工作内容作出结论并监督执行。文化教育机构处下设有电影、广播、无线电和戏剧方面的顾问团（Консультанты по вопросам кино, радиовещания, радиофикации, театра）和政治教育机构科（Сектор политпросветучреждения）两个部门。

印刷品处编制有 35 人，是中央宣传鼓动局内部最庞大的下属部门。它的主要功能是对中央、地方和加盟共和国的报刊杂志工作进行审核和监督，参加对报刊杂志社的干部检查和甄选工作，审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对塔斯社（ТАСС）和书籍与出版事务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的工作进行监督，直接领导（Прессбюро）的工作。它设有六个专门的科室：中央报纸科（Сектор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газет），地方、边区与加盟共和国印刷品科（Сектор областной, краево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печати），区印刷品科（Сектор районной печати），杂志科（Сектор журналов（центральных）），出版机构科（Сектор издательств），印刷与纸张科（Сектор полиграфии и бумаги）。

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教育与进修处的编制为 18 人。它的主要职能是组织、检查与指导党员培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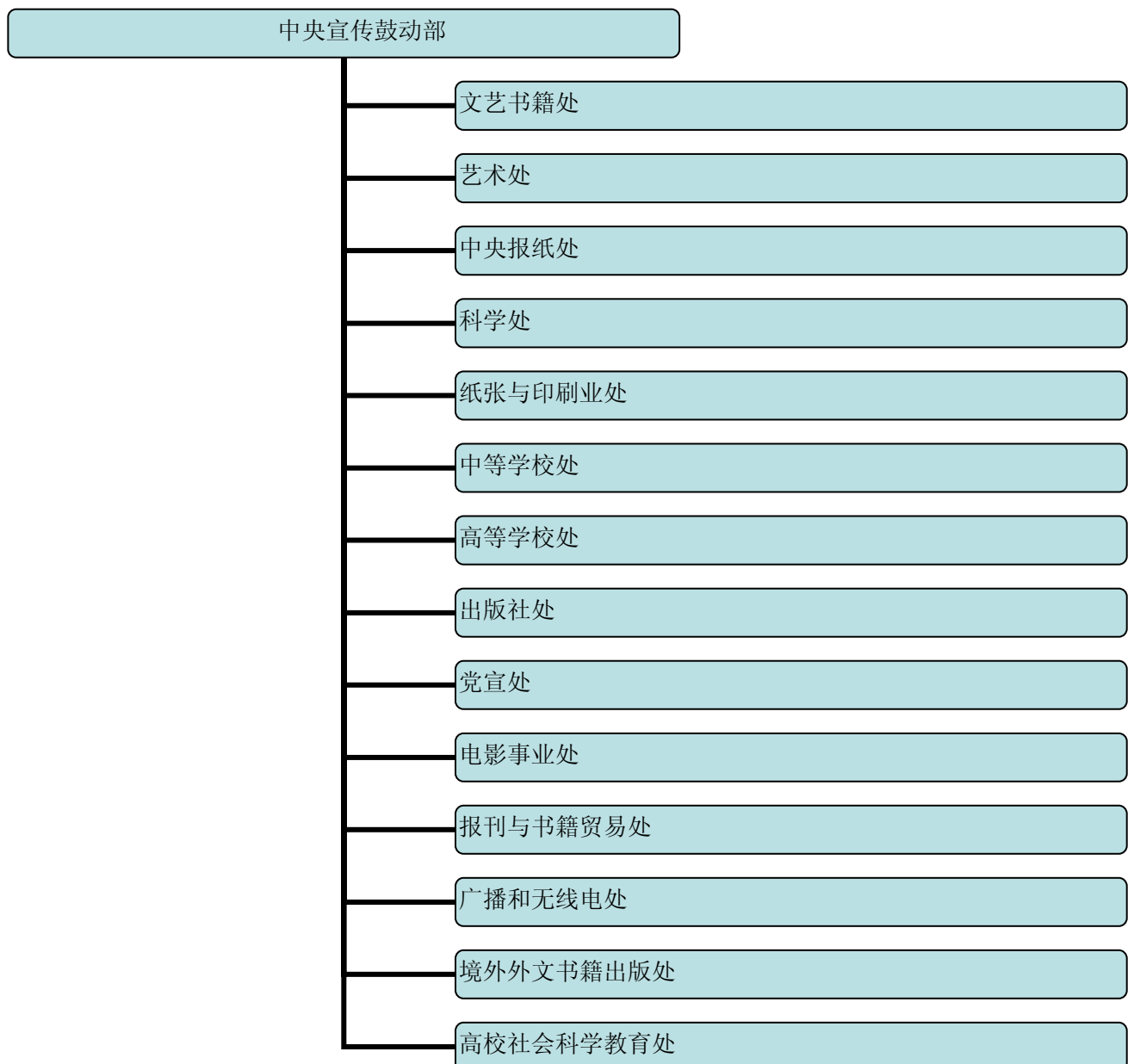


班和党校的工作，审核党员和列宁主义培训班的教材样本内容，参加党员培训班和党校授课人员与领导干部的遴选工作。除此之外它还负有检查各个部门内部培训班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工作的职责。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教育与进修处下设有两个科室：党员和列宁主义教育培训班科（Сектор партийных и ленинских курсов）和宣传工作者和报刊工作者进修与培养科（Сектор пере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подготовки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х и газет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

责任组织部编制为 12 人，负责组织各人民委员部政治部（Политуправление наркоматов）的宣传鼓动工作和地方党组织宣传鼓动领域的工作。

宣传鼓动局秘书处（Секретариат УПА）有工作人员 35 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1948 年 7 月的联共（布）中央机构改组，宣传鼓动局升级成宣传鼓动部，新的中央宣传鼓动机关组织结构如下：



### 三、40-50 年代中央宣传鼓动部职能的强化

卫国战争后，斯大林授意日丹诺夫掀起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绝非偶然，恰恰反映了斯大林本人对战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忧虑。斯大林等人认为此一时期人民的思想状况堪

忧。战时和战后苏联国内外有着大量人员流动，苏联国内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与西欧宽松与自由的文化氛围之间的反差，使他们心中迸发出思变的火花，这些走出过国门、或受其感染的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主张对西方文化实行开放政策的愿望，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一定的向往自由化的倾向。斯大林敏锐地感知到了这股涌动的思潮并深感忧虑，他认为只有通过掀起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将自由化倾向扼杀在萌芽之中，才能从思想根基上巩固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正是出于此目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 1946 年 4 月 13 日通过决议，批评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严重不足，未能揭发在各个领域的落后意识形态工作，并责令宣传鼓动局建立自己的机关报《文化与生活》（«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用以通报和揭露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落后状况。<sup>①</sup>5 天之后，即 4 月 18 日，日丹诺夫亲临宣传鼓动局召开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严重不足和巨大失败……要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因此他要求宣传鼓动部迅速改正错误并改进工作，加强宣传鼓动机关的人员配备。<sup>②</sup>

到 1946 年 4 月，苏联中央类报纸 21 份，加盟共和国、城市和边区类报纸 5610 份，报纸的印刷量严重不足，平均每千人仅 90 份报纸。<sup>③</sup>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 19 个分部，管理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到 1946 年 6 月，在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共计 259 人，其中 239 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些人中大多数接受的是人文科学教育（224 人）。但是他们都是在 1939 年以后进入宣传鼓动部工作的新干部，大部分人工作时间不超过 5 年，<sup>④</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过心理战。

从 1946 年到斯大林去世前，中央宣传鼓动部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大致包括如下具体活动。

1、借历史题材来进行苏联爱国主义宣传，为此宣传鼓动部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出台了在苏联居民中宣传苏联爱国主义思想的措施计划。<sup>⑤</sup>该项计划的目的是将蒸汽机和无线电在内的许多科学技术成果的发明权和首创权揽到俄国科学家身上，借此来增强苏联人民的科学自豪感。为此联共（布）中央责成国立技术理论书籍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ехник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出版了《俄罗斯科学伟人》（«Люди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一书，该书列出了 80 多位在科技发展历程中对人类有突出贡献的俄国科学家。<sup>⑥</sup>对此做法，马龙闪先生认为，“由于宣传爱国主义而夸大俄国科学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以致出现某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让这种思想浸染了官方的意识形态。”<sup>⑦</sup>为了贯彻中央的这一措施，中央宣传鼓动部专门组织了对教材和科学著作的清查工作，将不符合这一爱国主旨的书籍，斥为含有“严重的错误”书籍，要么将其删改，要么整本封存或销毁。<sup>⑧</sup>如前文已有叙述，A.M.别达即认为 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后期，苏联政治文化的发展主流可认为是通过历史题材在文艺创作中的流行来发扬民族自豪感，并以此弘扬爱国主义主旨。

2、在所有领域持续进行反“卑躬屈膝（Раболепство）”和“世界主义”等运动，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头戏。宣传鼓动部根据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指令，指出在文学、音乐、戏剧、哲学、历史等各个领域都隐藏着一大批崇拜资产阶级文化与伪科学的“卑躬屈膝者”和“世界主义者”。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就是因在西方文化和外国人面前以“卑躬屈膝”的罪名被打到的。对以穆拉杰里（В. Мурадели）的作品《伟大的友谊》（Великая Дружба）为代表的“形式主义音乐”

<sup>①</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Из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вопросы оргбюро и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ВКП(б)":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газе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3.04.1946, Документ №12.

<sup>②</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ВКП(б) А.А. 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агитпропе ЦК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паганды, 18.04.1946, Документ №13.

<sup>③</sup>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5. Д. 376. Л. 2, 8.

<sup>④</sup>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5. Д. 376. Л. 84, 85.

<sup>⑤</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пропаганде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ид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 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8.04.1947, Документ №38.

<sup>⑥</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Записка К.Е. Ворошилова Н.А. Вознесенском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Люди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 30.08.1947, Документ №47.

<sup>⑦</sup>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8-209 页。

<sup>⑧</sup> 详情可参见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Агитпроп ЦК о "серьезных ошибках" в книге Ф.Л. Вейткова "Летопись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а" 01.12.1947, Документ №54 等档案内容。

( форм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музыка ) 也进行了穷追猛打式的批斗, 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决议认为该献礼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歌剧, “不论是在音乐上, 还是情节上都是错误的”,<sup>①</sup> 并以此连带了一批形式主义音乐家不得不接受“荣誉法庭”( Суд чести ) 的审判。<sup>②</sup> 就连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大洛夫本也在这场批判大潮中因其《西欧哲学史》(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一书遭斯大林钦点批判而被撤销局长职务。<sup>③</sup>

3、在国内外进行反美反帝宣传, 这是在冷战形势下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马歇尔计划的出台, 使苏美连形式上的战时同盟都难以维系, 两大阵营走向集团对抗。在这一时期宣传鼓动部有目的地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和措施, 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类组织加强反美反帝宣传。为此 1949 年 3 月 1 日宣传鼓动部出台了在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的措施计划的文件, 要求“组织一系列报刊杂志有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sup>④</sup> 1949 年 4 月 1 日苏联作家协会(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 根据宣传鼓动部的要求专门拟定了加强反美宣传的措施草案, 其内容就是作家协会组织人员以戏剧、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为载体, 来丰富反美反帝宣传的形式与内容。作家协会列出了一系列即将要出版的反美题材的作品, 这些文学作品随后相继问世。<sup>⑤</sup> 这便是战后苏联文艺创作中的“国际题材热”, 它的着眼点正是反美反帝宣传。同年 10 月 6 日, 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夫关于 1949 年 10 月在境外广播内容选题的报告, 在该报告指出一方面要在境外宣传苏联的巨大建设成就, 另一方面要加强反美反帝宣传力度。<sup>⑥</sup>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以贯彻斯大林极左路线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 根据联共(布) 中央的指示与命令, 宣传鼓动部也在不断地调整自身工作重点, 以期完成在国内外的宣传任务。

正如上文已有论及, 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在 1946 年 4 月 13 日召开会议批评宣传工作严重不足之后, 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于当月 18 日在宣传鼓动局召开宣传问题会议, 分析导致当前宣传工作落后的原因, 他讲话中援引斯大林的指示说, “治疗意识形态战线工作不足应该从上面开始, 从中央宣传机关开始”。<sup>⑦</sup>

次年 1 月 8 日, 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大洛夫上呈库兹涅佐夫报告, 请求将斯摩棱斯克州主管宣传工作的党委第一书记波波夫( Д.М.Попов ) 调任为宣传鼓动局副局长, 以及在地方州党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勒扎诺夫( Б.С.Ржанов ) 等人调入宣传鼓动局工作, 其目的是以“有党政和宣传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来加强宣传鼓动机关”。<sup>⑧</sup> 虽然波波夫调入中央宣传鼓动部迟至 1949 年 8 月, 职务也只是副处长, 而不是先前亚历山大洛夫所提名的宣传鼓动局副局长。1948 年 7 月 13 日谢皮洛夫上书日丹诺夫要求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 Гослитиздат ) 社长戈洛文琴科( Ф.М.Головенченко ) 调入宣传鼓动局, 伊里切夫( Л.Ф.Ильичев ) 和斯列波夫( Л.А.Слепов ) 等人在部门内部调整职务。<sup>⑨</sup> 从这两条档案的阅读可以明确, 这种旨在加强中央宣传机关干部配置的工作从未停止。

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的运动中, 宣传机关的首脑—宣传鼓动局局长亚历山大洛夫本人也未能幸免。作为苏联著名哲学家, 亚历山大洛夫因其著作《西欧哲学史》一书因其学

<sup>①</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б опере "Великая Дружба " В. Мурадели", 10.02.1948, Документ №61.

<sup>②</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Записк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И. Лебедева А.А. Жданову 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суд чести" над "музыковедами-формалистами", 12.03.1948, Документ №63.

<sup>③</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7.09.1947, Документ №49.

<sup>④</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01.03.1949, Документ №128.

<sup>⑤</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роект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 союзу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Документ ССП СССР, 01.04.1949, Документ №138.

<sup>⑥</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ову о тема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радиопередач на зарубежные страны на октябрь 1949 г. 06.10.1949, Документ №204.

<sup>⑦</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ВКП(б) А.А. 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агитпропе ЦК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паганды, 18.04.1946, Документ №13.

<sup>⑧</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А.А. Кузнецову с просьбой укрепить агитпроповский аппарат опытными руководящими кадрами, 08.01.1947, Документ №32.

<sup>⑨</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заведующего агитпропом ЦК Д.Т. Шепилова А.А. Жданову о заместителях заведующего агитпропом ЦК, 13.07.1948, Документ №73.

术上有争论演化成严重的“政治错误”，在1947年9月17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中被撤销局长职务，由联共（布）中央党组织监察局（Управления по проверке парторганов ЦК ВКП(б)）局长苏斯洛夫接任。宣传鼓动局第一副局长、哲学家、1946年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多谢耶夫（П.Н.Федосеев）也因此事丢掉了职务，但是撤销他的理由却是另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作为《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杂志的总编辑，为了其更好地将精力投入到改善对杂志的领导中去”，接替他职务的是由《真理报》调来的谢皮洛夫。<sup>①</sup>两天后，即9月17日，新任局长苏斯洛夫召开关于宣传鼓动工作领域现状的会议，在会上他提出：“宣传鼓动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应该参加到对意识形态工作和对本职工作领域现状的讨论中去”，虽然“在去年斯大林同志专门对大力改善宣传鼓动工作做出了指示，根据这些指示也制定了宏观方面和具体层面的措施，但你们是如何将这些指示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的？”<sup>②</sup>很显然，从苏斯洛夫的讲话中明显感知到他对目前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多有不满意的。

1948年6月17日谢皮洛夫上呈日丹诺夫关于现在中央宣传鼓动局工作基本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谢皮洛夫罗列了整整27条宣传鼓动局拟定的近期内可进行的具体工作，以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兹可列举如下<sup>③</sup>：

- 1、设立门捷列夫国际奖作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励。
- 2、设立高尔基国际奖作为文艺领域的最高奖励。
- 3、改善境外广播的措施。
- 4、强化无线电广播的物资技术设备。
- 5、联共（布）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 6、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的工作。
- 7、《布尔什维克》杂志问题。
- 8、整顿联共（布）事务管理局的书籍发行工作和停止免费向党的工作人员提供书籍。
- 9、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工作。
- 10、改善大学教育和向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提供帮助的措施。
- 11、苏联科学院现代东方学院的教育问题。
- 12、《哲学史》一书的纲要。
- 13、部分杂志的整顿问题。
- 14、《鳄鱼》杂志问题。
- 15、《中学外语》杂志的出版问题。
- 16、增加报刊收入问题。
- 17、列宁格勒剧院的戏剧《多彩的生活》演出问题。
- 18、在苏联非俄罗斯族中学改善俄语教学的问题。
- 19、北方边区教育干部的培养问题。
- 20、联共（布）州党委、边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进修问题。
- 21、改善苏联民族文学书籍译成俄语的问题。
- 22、对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国歌和加盟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执行问题。
- 23、政治宣传画出版工作的不足和改善措施。
- 24、全俄戏剧协会问题。
- 25、两卷本《列宁和斯大林论党的建设》一书的再版问题。
- 26、《苏联小百科全书》的第三版出版问题。

<sup>①</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7.09.1947, Документ №49.

<sup>②</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М.А. Сул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агитпропе ЦК по вопросу состояния работы в области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19.09.1947, Документ №50.

<sup>③</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Д.Т. Шепилова А.А. Жданову об основ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текущ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6.07.1948, Документ №74.

## 27、召开第一届全苏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问题。

这 27 条提交给联共（布）中央讨论的报告，构筑了目前宣传鼓动局的工作重点，勾勒出当下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具象。仔细分析这些精心策划的提案，我们可以发现从荣誉头衔的设立、境外广播的选题与技术设备保障、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的工作、各类报章杂志的内容、俄语在全苏的推广与普及，到各级党政机关干部培养、重点控制的书籍内容审核、文艺团体的集会与日常工作等等都囊括在中央宣传鼓动局进行的意识形态工作范围之内，其中任何组织与个人本职工作的偏差与错误都可能成为发起意识形态批判的起点。由此可见此一时期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严、监察范围之广。甚至在这 27 条提案中，讨论与施行也有轻重缓急之分，如下 8 条便是要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近期内优先讨论的：

- 1、改善境外广播的措施。
- 2、强化无线电广播的物资技术设备。
- 3、关于联共（布）中央社会科学院的工作。
- 4、《布尔什维克》杂志。
- 5、增加报刊收入问题。
- 6、设立国际门捷列夫奖作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励。
- 7、设立国际高尔基奖作为文艺领域的最高奖励。
- 8、联共（布）州党委、边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进修问题。

宣传鼓动部在中央书记处的具体职能上文已有陈述，大体是替代中央拟定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报告，向中央征询关乎意识形态问题的具体事宜的处置，以及依据中央的指示和决议处理各种自下而上的请示与汇报。实际上在中央书记处，对宣传鼓动部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权力界定，它只能事无分巨细向上汇报以获得明确的权限，以至于宣传鼓动部在运行中有时竟自身所拥有的权力无法确定。如 1949 年 2 月 8 日，宣传鼓动部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指出，从 1948 年 12 月 1 日到今年 2 月 1 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文化局共向宣传鼓动部递交了 34 份有关意识形态的文件请求批准，但是宣传鼓动局认为由它来批准这些文件是不合适的，因为联共（布）中央并没有做出指示来赋予它进行相关工作的权限。<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波及到了宣传鼓动部内部。上文已有提及，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正是因为其著作《西欧哲学史》在哲学界受到激烈批判而失去部长职务的。

1949 年 1 月 8 日宣传鼓动部在上呈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虽然联共（布）中央在两年半之前就出台了“关于戏剧工作和改进措施的决议”<sup>②</sup>，但是目前的戏剧工作仍旧存在严重问题，宣传鼓动部艺术处的共产党员们并没有采取措施来从根本上改善戏剧工作，一贯支持艺术事务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领导戏剧工作的不正确路线，且对中央出台的关于戏剧工作落后现状的决议也有抵触情绪。<sup>③</sup>实际上宣传鼓动部对下属艺术处的批判与开战，是苏联全部宣传机关开足马力批判整个戏剧界的先声。同月 28 日，《真理报》刊发了编辑部文章《一个反党的戏剧评论家派别》，正式揭开了在戏剧界中批判世界主义的大幕。<sup>④</sup>宣传鼓动部艺术处的工作人员留里科夫（Рюриков）和普罗科菲耶夫（Прокофьев）被解除职务以后，联共（布）对此二人的工作安置给予了额外的关注，于同年 3 月 19 日专门颁布决议，指出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为他们安排的新工作，使其“可能对艺术事务委员会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sup>⑤</sup>显然，宣传鼓动部艺术处在中央受到这种挂号式的重点照顾，是与其操办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力度不够紧密相连的。1950 年 4 月 20 日，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宣传鼓动部文艺书籍处又

<sup>①</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полномочий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08.02.1949, Документ №104.

<sup>②</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репертуаре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театров и мерах по его улучшению", 26.08.1946, Документ №21.

<sup>③</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слову о недостатках в работе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сектора искусств, 08.01.1949, Документ №92.

<sup>④</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Об одной анти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е театра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статья "Правды", 28.01.1949, Документ №100.

<sup>⑤</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ВКП(б) по вопросу о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е бывш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9.03.1949, Документ №127.

受到了批判，指导员尼古拉耶夫（В. Николаев）和费多诺夫（П. Федун）指责文艺书籍处的负责人马斯林（Маслин）是个“没有原则的、只关心自己前途的人，对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大搞形式主义”，并且他“在宣传鼓动部工作的时间一个月不超过三天，虽然经常‘生病’，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撰写自己的学问论文，写书和各类文章。治疗他的医生，也对其经常请病假感到莫名其妙。”<sup>①</sup>这些宣传鼓动部内部的攻讦和揭发，与联共（布）中央对其宣传鼓动工作落后的批评相映成辉，共同构成了苏联意识形态整肃范围之广的缩影。

随着联共（布）中央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结果，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目标的转递，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构成也在不断地变动。

论专业背景，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是文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面的专门人才，或者是外语这样的实用型人才，其中不乏苏联科学院院士或通讯院士，他们要么由一些党政机关、报刊媒体、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调任而来，要么在宣传鼓动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调到这些机关和单位中去。像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本人就是苏联著名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在被撤销宣传鼓动局局长后，又出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可将其这样的宣传鼓动部高级领导人列为“学者型官僚”或是“政客化的知识分子”。需要注意的是在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和部门正副负责人中，很多还兼任有其它党政机关、报刊媒体、出版机构和学术机构的职务。例如在对《星》杂志和《列宁格勒》杂志批判后，联共（布）中央勒令《列宁格勒》即行停刊以示惩罚，同时任命叶戈林（Еголин）为《星》杂志的主编，同时保留其宣传鼓动局副局长的职务。<sup>②</sup>在苏联的这种意识形态工作框架下，作为监督者的宣传鼓动部，与被监管对象各党政机关、报刊媒体、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之间的工作人员置换，反映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本身建立了一套稳定的循环机制，这种循环机制中监督者能准确地对被监督者传达出命令与要求，而被监督者也能更好地理解并执行监督者的给予其的任务。

关于这一时期的宣传鼓动部的特点，粗略可归结为如下二点：

1、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发动起来，带有强烈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色彩自不待言，笔者想谈谈的是日丹诺夫主义。上文已有提及，自1934年起在联共（布）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就是日丹诺夫，他主张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要求将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自日丹诺夫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起，除了二战期间稍有松缓外，意识形态控制的缰绳一直牢牢地拴住整个苏联，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来规训文艺创作，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用政治打压和棍棒政策来处理学术争鸣，这种事例屡见不鲜，因此而失去工作乃至个人生命的知识分子更不在少数。粗暴干涉与行政制裁，这种极其粗陋和简单的方式，被联共（布）中央奉行的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灵丹妙药。日丹诺夫去世之后，执掌意识形态工作权柄的苏斯洛夫继承墨守方针，继续维持这种毫无生气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批判，直到赫鲁晓夫实行“解冻”的文艺政策后才有所改观。

2、奉行文化上的孤立主义与教条主义保守政策。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出台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该决议规定了党在20年代的文化总路线和总政策，特别是“领导文学要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应当‘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sup>③</sup>但是这个不干预文艺生活的政策，随着它的主要制定者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和布哈林（Бухарин）相继被打倒，建立起来的是带有强烈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个人色彩的文化专制政策。这种政策尽最大可能斩断与国外的俄国侨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不管是官方层面上的，还是个体形式上的思想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能到苏联进行文化交流的，大都是对苏联保有好感的左翼作家，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侨居意大利的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斯大林亲自组织的强大

<sup>①</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роли секто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в кампании 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 20.04.1950, Документ №228.

<sup>②</sup>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с правкой И.В. Сталина, 14.08.1946, Документ №19.

<sup>③</sup> 同上，第75页。

公关下最终回国出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这种孤立主义和教条主义文化政策中，强制性地只允许有一种文艺创作理论和方法，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了文艺创作只能图解联共（布）中央关于政治、经济和文艺等诸多领域的政策，换言之只能粉饰天下太平，决不可表达任何对苏联的任何不满，也不能揭露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任何弊病和缺陷，就连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一定要证明苏联的科学研究和科技政策优越于西方。

## 第二节 红色教授学院和高等教育大改革

### 一、高等学校的调整与改革

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苏维埃政权放松（也包含无暇和无力）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界出现了较强的反苏浪潮。

部分教授坚持“高校自治”的主张，对抗俄共（布）对高等教育的领导，甚至在1922年初鼓动了包括莫斯科、彼得格勒、萨拉托夫等地高校的罢课罢教。1922年2月在莫斯科大学发生了教授和大学学生的罢课事件。西伯利亚出现了反对在大学教学计划中开设公共课程的抗议。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发生了大学生罢课事件。<sup>①</sup>列宁格勒苏维埃改选期间，一些教师领导了坚决反对选举“党棍苏维埃（Совет партийцев）”的活动，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劝说（选民）不要给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投票。<sup>②</sup>在一系列会议中，持反苏立场的教师们公开发表反苏言论。“第二届全苏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在对教育人民委员会（Наркомпроса）政策的极其不满的氛围中进行的，并以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工作者在一系列尖锐的反对卢那察尔斯基和霍多罗夫斯基（М.Ходоровский）的发言而引人注目。发言所涉及的问题有：工资问题、教学计划的经常变动、人民委员对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条件的无知和大学本身存在的问题等。<sup>③</sup>在新西伯利亚举行了第一届西伯利亚科学研究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一名教授尖锐批评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在会议中间休息期间，教授们互相谈论着：“苏维埃政权是恶棍（рвань），是一伙红色匪帮（красная сволочь）；共产党员是瓦解祖国和人民的人。”<sup>④</sup>在列宁格勒市各区举行了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一些教师在发言中抨击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十年间没对教师做过一件好事。把他们折磨得赤贫，现在给他们可怜的施舍。”<sup>⑤</sup>

在彼尔姆大学，谢尔佐夫（Д.И.Сырцов）教授将自己周围的一心反动的教授们联合成派，力图保留大学的领导职位……这一派一向习惯于坚决破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威信从而在大学生中获得威信。经科学工作者小组成员同意，谢尔佐夫教授在苏维埃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下列要求：1）废除苏维埃的高校条例，恢复旧的沙皇时期的条例；2）撤消大学生在高校的行政管理权；3）撤去党在大学安插的人；4）必须在院士当中选举校长而不是指定共产党员担任。”<sup>⑥</sup>莫斯科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领导反动教授和教授团体的多亚连科（И.Дояренко）教授提议创建一个独立于国家政权和政党之外的科学工作者协会。<sup>⑦</sup>

高等学校是教育的中心所在。布哈林在1923年强调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风格的新文化。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立法者就主张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文化教育事业，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意味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改变，并且要适应当时急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布哈林认为：“势必要通过那样的途径：首先培养干部，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实践统帅之下建立它的军官队伍，然后是士官阶层，然后是中介者的等等队

<sup>①</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332

<sup>②</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155

<sup>③</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154

<sup>④</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155

<sup>⑤</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639

<sup>⑥</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261

<sup>⑦</sup>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 Т.5 М.2003, с.260

伍。”<sup>①</sup>布哈林认为，“最高统帅部”，即教授构成的快速培养能够成为更新的源泉，它要比教会识字重要的多。在社会科学领域，教授共同体的充分改组成应该成是这一战略的成果。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的培养与教师构成的“无产阶级化”（пролетаризация）和“布尔什维克化”（большевизация）相关联，与建立新型的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相关联，与完善的教学计划、大纲、学术教育文献相关联，与将新的教学和创造方法引入集体和计划原则之中相关联。首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的学术力量应该占领资产阶级的阵地，直接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以区别于与资产阶级出身或与其有着密切的知识分子，以保障苏维埃政权“文化革命”的胜利，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忽略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之间、有知识与没有知识之间、职业化与非职业化之间的差别，尽管苏维埃政权宣布要将工人和农民提高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高度。因此，建立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体系在科学和教育干部培养中占据了首要位置。

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权的党和国家机构立即推行了高等学校改造运动。人民委员会和教育人民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令和决议以加强吸引工农青年入学和限制资产阶级出身者。1918年8月2日列宁批准法令，废除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特权，每个16岁公民都权利直接进入高校学习，不需要中学毕业证书或通过考试，为帮助工人出身并且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员顺利接受高等教育，教育人民委员会还于1919年在大学设立了（рабфаки）。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认为工人系是搭在高等学校窗口的“救火梯”（пожарные лестницы），以便于工人和农民借此踏入高等学校。

1918年10月1日颁布《关于俄罗斯共和国国立高等学校组成和结构的几个变更》（О некоторых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составе и устройст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еных и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首先宣布改变高等学校的干部构成，减少革命前时代的教师的数量，增加经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过的新教师的数量。改变从前所实行的将高校教师划分为副教授（доцент）、教授（профессор）、见习教授（адъюнкт-профессор）和候补教授（приватный профессор）作法，高校中独立工作的讲师可以获得教授称号。教授职位的候选人通过全俄竞争获得。到1918年10月10日在高校工作满10年或从事高等教育满15年的讲师，自1919年1月1日起自动废止其教职，通过全俄竞争才能恢复其教职。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苛严的法令，而苏维埃政权的宗旨即是旧俄时代的从教人员从高校驱逐。

第一次全俄范围内的挑选并没有达到政权预想的结果，实际上所有的教授职务都为拥有很高水平的旧教授们占据。显然，要彻底改变高校教师结构就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暴力，以及培养新一代的教授和讲师队伍。

1921年9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高校状况决议》（Положение о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决定将科学——教师干部划分为三部分：教授（从事教育人民委员会设立的独立课程的教学），讲师（在教授指导之下从事辅助性教学）和科学研究员（научные сотрудники）。教授职称需从业10年工作、讲师职称需从业7年工作获得。编外教授（сверхштатные профессора）和编外讲师（сверхштатны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职称需从业5年获得，科学研究员职称需从业3年，特殊情况需从业1年获得。

从1920年12月1日到1921年1月4日召开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党的会议。俄共（布）的基本路线归结为把高等学校变成“政治学校”，其综合任务包括：赋予高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导向，给予青年人政治教育，任命党务工作者为红色高校校长，加强党在高校社会科学教育中的理论力量，向高校派出青年党员青年。这次党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高校改革决议》（О реформе высшей школы。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在其报告中强调加强“社会——计划的综合措施”扩大青年党员的数量，尽管他们还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sup>②</sup>这次会议对社会科学的的教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做出了《关于高校社会科学教师构成考虑的决议》

<sup>①</sup>Бухарин Н.И. Борьба за новых людей. Роль кадров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из доклада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5 февраля 1923 г.) // Бухарин Н. Борьба за кадры. М.-Л.: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26. с.34-35

<sup>②</sup>Директивы ВКП(б)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М.-Л.: Госиздат, 1929. с.96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ысших школ по обществоведению),采取以下措施:  
1、清除资产阶级教授。2、立即从青年党员中充实红色教授队伍。<sup>①</sup>

从这个决议开始了红色教授学院的筹备工作。然而高校社会科学改组并没有局限于这个文件。1920年末到1921年2月11日冬天,专门负责高校社会科学改组的“罗特施坦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Ротштейна)开始工作,该委员会由罗特施坦院士(Ф.А. Ротштейн)领导。委员会成员波克罗夫斯基点明这个委员会的基本使命:如果旧的大学教授占据位置并且“繁殖”和“增生”,就不可能有社会科学的根本改革。<sup>②</sup>“罗特施坦委员会”的任务是吸引资产阶级专家为苏维埃科学和教育事业服务。该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将所有的有利高等教育发展的党的力量集中于教学之中,即吸收党员教授,以及有经验的但并不直接从事学术的党务和行政人员参与高等教育。其二,培养共产主义青年。派专业上受过训练、但并不具有充足经验,然而政治上可靠的青年成为资产阶级教授的助手,最终完全代替教授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工作。

在1920-1921年党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了“罗特施坦委员会”,但是在它的具体任务中没有特别关注吸引“旧专家”的工作,国家教育的根本改革计划在颁布了列宁的2个文件《俄共(布)中央委员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共产党员——工作者的指令》(Директив ЦК РКП коммунистам – работникам Наркомпроса)和《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О работе Наркомпроса)后实际上就终止了。列宁认为,新的科学和教育不可能凭空而建,因此社会科学和教育要利用旧专家,原则是:“第一,非共产党员专家应该在共产党员监督之下工作。第二,教学内容(包括普通教育课程,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培养)的确定,应该只由共产党员来从事。”<sup>③</sup>

1921年初完成了高等学校、包括社会科学教育的改革计划,其基本点在于:1、将“党的一切理论力量”占领社会科学教育领域。2、在短期内从工农中培养青年的党员教师干部,为此要立即着手“红色教授”(красные профессуры)培养工作。3、吸引资产阶级“专家”,使其在共产主义监督之下工作。

波克罗夫斯基认为培养青年党员教师的工作最初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在工农中间很少有人具体必要的理论水平并能自如地从事党的工作。即使是当时很有名的党的理论家,但也未必人人都能立即胜任在大学的理论和教学工作。<sup>④</sup>

吸引资产阶级专家参加新政权的教育工作也并不顺利。首先,这些革命前成为社会科学家的专家不想也不愿意放弃旧的世界观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也很难掌握新的理论和方法论。其次,严重缺乏必需的社会科学教学计划、大纲、教科书和辅助材料。第三,旧教授在对待新政权和新科学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不接受或者消极的态度。显然,1922年向国外驱逐教授和大学教师仅仅是政治整肃行动,实际上也是高校教学改革的组成部分,这一行动导致大部分教授转向反对派立场。

因此,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的任务就显得异常重要。然而,工农青年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没有特别的热情。尽管在党的决议中,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根据“苏维埃化”和“纯工人化”(орабочивание)的原则招收了大量的工农大学生(实际上是党、红军和共青团组织根据调令,强制性安排的)。波克罗夫斯基在红色教授学院建校一周年的时候乐观的估计,党已经确定好了正确的教育改革路线,“在本校培养未来的社会科学教师的事业中,我们只能依靠党的力量,非党人员只有显现特别的教学和科学能力才能给予优惠。指日可待,在不远的未来红色教授的构成将接受党自身的构成,即工人阶级在其中将占据支配地位。”<sup>⑤</sup>

<sup>①</sup>Директивы ВКП(б)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М.-Л.: Госиздат, 1929. с. 99

<sup>②</sup>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1965 / Редкол.: Ворожейкин И.Е., Ким М.П. (гл. ред.), Наумов В.П. М.: Мысль, 1968.

<sup>③</sup>Директивы ЦК РКП коммунистам – работникам Наркомпроса // Правда. 1921. 5 февраля.

<sup>④</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sup>⑤</sup>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1965 / Редкол.: Ворожейкин И.Е., Ким

## 二、红色教授学院的建立与特殊作用

1920年初，苏维埃政权各机构开始了社会科学教学改革准备工作。波克罗夫斯基回忆：立即“改组”大学教师结构的想法似乎是“可怕的、勇敢的和崭新的”，一些党员教授雄心勃勃“抽出”刚拿到的“生产计划”，从青年党员中选取合适人员取代资产阶级教授的工作也在积极筹备，但适合的大学教师从哪里培养呢？于是，一个想法在列宁的办公室中诞生了，即设立专门培养红色教授的大学。<sup>①</sup>列宁在1921年2月11日签署教育人民委员会法令《关于筹建红色教授学院机构》（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Институтов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法令规定：“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培养大批红色教授，为在共和国的高等学校讲授理论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史和苏维埃建设课程。”<sup>②</sup>

根据法令，红色教授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于1921年10月3日正式创建。校址即今天的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旁的“俄罗斯”电影院和普希金纪念碑处，这里原来是一处女子修道院。

最初，学院实行党的民主工作作风。根据它的第一位校长波克罗夫斯基的回忆：未来的大学生积极参与了红色教授学院的创建工作，他们挑选修道院的大楼，维修和整理宿舍。第一次讨论课是在位于小兹那明斯基胡同（Мало-Знамен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sup>③</sup>的社会主义科学院（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图书馆进行的。学院的第一次招生在红军政治部支持下完成，红军派来了年轻的士兵以及从战场上复员的青年人。这一事件表明，工人和农民还没有响应接受高等教育的号召。在头2-3年里，红色教授学院像其他高校一样，允许接受知识分子代表。因此在第一批大学生中，有习惯于在学习中遵守军队和党的纪律的复员军人、目标在于完成学业的革命前大学生，以及各社会阶层的自学者。后来，学院的大学生来源就有了目标性，开始采用主要招收党员身份的工农人员的措施，但困难很大，因为工农学生要么受过极少教育，要么根本不识字。绝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都来自“资产阶级阶层”，而来自工农阶层的中学毕业生根本不存在。

同时大学生的挑选也出现了问题，在宣布有关政策之后，从党的、共青团的和军队中派遣的大量的青年人充实学院。然而，所谓高比例的工农学生完全是虚假的现象。1924年，第一批毕业生诞生了，然而当年的入学者与此时的毕业生的出身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真实的情况是大部分毕业生来自非无产阶级阶层。

1921-1930年红色教授学院的听众超过3500人，其中完成学业者335人，退学者和被淘汰者达到90%左右。<sup>④</sup>

### 红色教授学院听众和毕业生人数统计

(\*为计划听众人数)

年份	听众人数	毕业生人数
1921	105	无毕业生
1922	151	无毕业生

М.П. (гл. ред.), Наумов В.П. М.: Мысль, 1968., С.6-7.

<sup>①</sup>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 19. М.: Изд-во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юстиции, 1921.

<sup>②</sup>Синецкий А.Я. Профессорско-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ие кадры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СССР. М.: Советская наука, 1950.

<sup>③</sup>现在是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大街（улица Маркса-Энгельса）。

<sup>④</sup>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ректора ИКП М.Н.Покровского 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 ЦК ВКП(б) об итогах работы института за 1921-1928 гг.: К истории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58. №6.с. 86-87; 9, ед. хр. 135, л. 12-13

1923	153	无毕业生
1924	179	51
1925	217	53
1926	294	39
1927	384	23
1928	483	29
1929	546*	42
1930	1076*	99
总计	3588	335

在毕业生中党员学生年平均仅占 2%，头 3 年的入学者中工人出身的数量下降，而职员（служащие）增长。<sup>①</sup>

#### 红色教授学院大学生中工人和职务出身数目的百分比统计

年代	工人出身	职员出身
1921	6,67	89,5
1922	8,0	87,4
1923	6,1	90,8
1924	21,0	71,0
1925	30,9	58,5
1926	30,61	59,86
1927	32,8	53,1
1928	39,75	55,38

1921-1928 年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生的社会来源为：7.2%出身于工人，2.8%出身于农民，90%出身于职员。到 1929 年，所有毕业生 236 人，其中只有 19 人为工人出身，在听众中已有 43.6% 为工人出身（1921 年为 6.67%）。<sup>②</sup>

<sup>①</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sup>②</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因此从工人中培养红色教授就变成了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作为主要的干部来源的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生数量在上述年份中比原计划逐年增加，而他们社会出身远未达到计划的标准。实际确定干部政策的大学生的“纯工人化”（орбочивание）方法特点变成了随心所欲和弄虚作假。干部政策没有紧密地联系挑选大学生的实际工作需要。

1924年俄共（布）中央通过决议建立红色教授学院预备部，它很快就成为无产阶级青年和学院之间的过渡环节。此时学院大学生的社会来源调整为三个来源：工人系、共产主义高校和预备部，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主要来源于预备部。在1929年学术委员会（учебная коллегия）的会议记录中写到：“预备部的基本任务是提高红色教授学院社会成分”“通过党的教育系统给直接来自生产的工人充分的发展和预备空间”。<sup>①</sup>红色教授学院制订一个有利于未来的大学生进入预备部的过渡方式——短期培训班，以适用于预先计划目标，如“偏远乡村”和“少数民族”的代表。经过上述各种方式的努力，1924年后的红色教授学院听众中无产阶级和工人出身的比例取得了较大增长。

红色教授学院基础部工人出身学员数量增加百分比<sup>②</sup>

年代	工人数量
1925	9.8
1926	19.16
1927	20.8
1928	29.45

尽管给予青年工人针对性的帮助，但是青年工人的代表仍然经常性被列入淘汰之列而转任实际的党务工作，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成绩极差，根本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能力，当然被淘汰还有其他原因，如课业负担过重和疾病。又如1922年党内清洗导致红色教授学院听众缩减13-15%。<sup>③</sup>

直至30年代初，大学生和毕业生的“纯工人化”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但是在高校领域招生政策仍然继续依据阶级出身的原则。1929-1930年通过了红色教授学院发展五年计划，其根本之处是宣布在坚持“无产阶级化”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原则之下将毕业生数量提高数倍。条件是党的委员派遣预备部学员的方式与“积极上层网罗”，即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方式结合起来。<sup>④</sup>为了实现这一干部培养任务，在1930-1931年将红色教授学院划分为几个独立学院。学院的“无产阶级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

红色教授学院在培养苏维埃的红色社会科学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红色教授学院做为第一个党的高校，其目标是培养苏维埃社会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和大学教师，还包括党的宣传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国务活动家和经济领导者。同时还存在着其他几个类似的机构，如共产主义科学院（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联合会（РАНИОН）和共产主

<sup>①</sup>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Ф.5284, оп.1. ед.хр. 336, л. 109

<sup>②</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sup>③</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sup>④</sup>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АРФ). Ф.5284, оп.1.ед. хр. 135, л. 33

义大学（комвузы）等等。但是，在 1930 年代 79.8% 的科学组织工作者是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研究生和大学生。只有 5.3% 毕业生在科学机构工作，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占全部科学工作者的 8.7%。<sup>①</sup>

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成为苏维埃社会科学院梯队建设的首选要素，它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政策的影响直至 60 年代。红色教授学院的基本影响在于，它确立了培养苏维埃类型的社会科学家的专业标准和规则。学院本身也成了生产符合苏维埃政权政治标准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批判反苏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实验室。正是在红色教授学院里发动了批判托洛茨基分子（троцкисты）、孟什维克唯物主义者（меньшевистсвующие идеалисты）和布哈林派的思想斗争。在红色教授学院完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纲，确定了教学大纲、教科书和高校大纲的结构。1929-1928 年，在红色教授学院从教 46 人，其中 24 人是不同年代学院的毕业生，很多人从大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教学工作，尽管他们未完全获得知识和职业训练，但是他们是党员学生。75% 的教授——讲师年龄低于 45 岁。<sup>②</sup>

1938 年，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将红色教授学院改组为隶属于联共（布）中央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高等学校（Высшая школа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при ЦК ВКП(б)），红色教授学院结束了其 17 年的办学历史。当代俄罗斯社会学家科兹洛夫（Л.А.Козлова）评价：红色教授学院“是祖国科学、教育、文化领域的干部培养的象征，特别是培养拥有阶级性和党性的脑力劳动者的实验地。”<sup>③</sup>

### 第三节 苏联政府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

####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国内的封建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共势力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试图依靠军事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新政权瓦解，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苏维埃政权也遇到了反共的资产阶级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说的大规模进攻。因此，苏维埃政权迫切地需要建立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

1918 年 4 月，列宁发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对新政权如何发展科学事业作了重要的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于 1918 年 6 月批准了“共产主义研究院条例”，建立共产主义研究院，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宣布“研究和教授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出发的社会知识以及同上述知识有关科学”作为该院的主要任务。

彼得格勒科学院得到保留，但由于在帝俄时期发展极其缓慢，到 1917 年它只有 13 个研究机构，包括一个历史考古研究所，5 个实验室，5 个博物馆，2 个观象台。苏维埃政权拨款发展科学院，1918 年将其名改为俄罗斯科学院，到 1925 年俄罗斯科学院已经拥有 40 个研究机构。1925 年 7 月 27 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俄国科学院为全苏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和中心，9 月，全苏隆重庆祝俄罗斯科学院建院 200 周年，苏维埃政权宣布将俄罗斯科学院正式更名为苏联科学院（АН СССР）。

1919 年建立俄国物质文明研究院，集中研究考古学和人种学的问题。

为了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于 1936 年将苏联科学院和共产主义研究院合并。在科学院系统中设立社会科学部，内分为经济学、哲学和法学部，下辖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法律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

<sup>①</sup>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Об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Красная новь, 1923. с.18, 24

<sup>②</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sup>③</sup>Козлова Л.А. 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1920-е годы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 4.

在新政权建设过程中，党中央特别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他文化落后地区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从俄罗斯、乌克兰等经济、文化和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抽调大量的有知识的干部和专业人员到西伯利亚、中亚、北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中学和大学以及建设科研机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建立了科学院，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建立了苏联科学院分院。到40年代中期，中亚五国均建立苏联科学院分院。1933年12月，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埃·赫里欧从苏联旅行回国后写道：“苏联把科学宣布为自己的法律，科学真正成了新俄罗斯的偶像。”

卫国战争期间，由于经费紧张等原因，苏联的人文社会发展较慢。1941年7月1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制订了战争时期科学研究工作和选题计划的主要方向，以适应战争的需要，这个计划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批准。许多社会科学家，如历史学家A·M·潘克拉托娃院士、A·Φ·米列尔、Φ·И·卡托维奇、Φ·B·卡托维奇—鲍爵姆金被转移到中亚等地区，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家们自觉地把自已的研究课题与战时需要结合起来，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了法西斯的历史和思想体系，揭露德国法西斯仇视人类的思想意识，论证法西斯主义最终灭亡的历史规律。另有许多科学家投笔从戎，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有的人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走出书斋，走向民间，组织有关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的专题讲座，在民间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

苏联政府克服困难，建立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教育科学研究院，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以及加盟共和国一级的科学院。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仍处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专断的阴影之下。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20大会议的召开，拉开了苏联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序幕，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解冻”，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

1953年8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把原经济学部和法学部改为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国家与法研究所，10月经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批准生效。1956年，哲学研究所又新增加了无神论、心理学和美学等三个研究室。

1968年12月，苏联科学院新设立具体社会学研究所，并且在列宁格勒设有一个分所。主要任务是：开展研究工作，培养副博士。科学院院士A·M·鲁缅采夫任该所所长。1972年该所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所，其研究方向也有变化。下设7个研究室，拥有400多名研究人员。是全国社会学的主要科学研究和协调中心，该所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学情报资料储存库和相应的学术交流网。

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极为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苏联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问题研究的研究所大都是在1956年到1969年间建立的。苏联政府还重视与国外社会科学界的交流，最初是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交流，后来扩大为与英、法、意、联邦德国、芬兰、瑞典、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交流。为了协调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1975年苏联成立了由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等各有关机构组成了社会科学国际合作委员会，作为苏联从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中心和协调机构。

1971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在哲学和法学学部下建立心理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B·Φ·洛莫夫。该所的主要研究方向理论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心理生物学以及专门的实用心理学问题。

1975年苏联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在列宁格勒成立，该所为跨学科的研究所。主要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劳动集体和工作人员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制订社会发展规划的方法，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等。

到60年代初，遍及全苏各个地区和各个专业的科学院科研体系已经建设。为了便于领导，苏联科学院按知识领域分成“部”，“部”领导“学部”，“学部”下设各种专业研究所。“学部”

是苏联科学院科研工作和科研组织工作的主要环节，它不但负责领导其所属的各研究所，而且还负责领导整个苏联国内的相应学科和研究机构。1959年，苏联科学院设有9大学部，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学部有5个，即：物理和数学部、化学部、地质学和地理学部、生物学部、工艺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有4个，即：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哲学和法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1963年调整为16个学部，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仍然为4个。

以往苏联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机构受苏共中央直接领导，甚至研究任务也由苏共中央直接下达。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于1926年建立了学术、教学和出版管理委员会。这种管理体制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协调和开展，经苏共中央批准，于1966年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工作，并与教育部和中等职业教育部各研究机构，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密切合作。科学院主席团分成3个大部：物理技术和数学科学部，化学技术和生物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部。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阿列克·M·鲁缅采夫负责主席团的领导工作。

1975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副院长会议，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在会上做了题为《社会科学的迫切问题》的报告，他强调：“苏联社会科学家的主要努力集中于综合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上”。他在1976年的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苏联科学院已有250年的历史，它在全苏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是一个参谋部和中心。目前，全苏科研队伍约150万人。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所谓基础理论研究是指具有主导作用的探索性科学研究，其实质在于揭示自然的发展规律。基础研究的成就有助于物质技术基础建设问题的解决，又能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的文化和福利状况。”到70年代，苏联科学院共有70多个各类科学机构。截止1975年1月，苏联科学院各机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5万人，其中科学家约39000人。科学院院士245人，通讯院士448人，外国院士62人。

苏联科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世界经济与地区经济、政治学和政党组织、社会学、苏联历史和世界通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部下设的研究所有：东方学研究所，斯拉夫学研究所，苏联历史研究所，世界通史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国家与法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非洲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乌法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经济研究所，自然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所，米克鲁霍——米克莱人种学研究所等。

此外，为便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加强经济落后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战备的需要，苏联科学院按照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特点建立若干分院和中心。主要有：西伯利亚分院（设在新西伯利亚），远东中心（设在海参崴），乌拉尔中心（设在乌拉尔），西北中心（设在列宁格勒），北高加索中心（设在顿河—罗斯托夫）、伏尔加河流域中心（设在古比雪夫）。其中西伯利亚分院最具特色，它是1957年由苏联科学院与俄罗斯联邦共同出资建立。该所所址设在苏联的远东科学城——新西伯利亚，在这里工作的各学科科研人员有数十万人之多。西伯利亚分院既是苏联科学研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业务上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同时在行政上又受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领导，其财政预算来自俄罗斯联邦。

与此同时，14个（俄罗斯联邦除外）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也全部建立，这些科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建制与苏联科学院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一些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根据本民族文化特点、经济发展特点和地域特点设立了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研究机构。截止1975年，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共有40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工作者42000余人。

按照国际的惯例，苏联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称号设为院士，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名科学家也被授予院士称号。苏联时代的科学院院士分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院士和通讯院士的名额由苏联部长会议确定。院士和通讯院士的选举一般

每两年选举一次，以及时补充空缺或新增的名额。苏联科学院的最高机关是由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组成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会议每年召开两次，院士拥有表决权，通讯院士拥有建议权。大会休会期间，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科学院的工作，各学部的工作由学部秘书集中管理。

1953年10月19—26日，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哲学和法学部、历史学部和文学语言学部为纪念苏联共产党建立50周年，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选举出新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当选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的院士有К·В·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政治经济学专业）、П·Ф·尤金（哲学）。通讯院士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Д·Т·谢皮洛夫、В·П·季亚琴科、А·И·巴什科夫。哲学专业方面有Ф·В·康斯坦丁诺夫、В·С·科鲁科夫、М·Д·卡马里。经过增补后，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院有下列院士：Г·Ф·亚历山大洛夫（哲学）、Е·С·瓦尔加（经济学）、А·Я·维辛斯基（法学）、Л·Н·伊万诺夫（经济学）、М·Б·米丁（哲学）、В·С·涅姆钦诺夫（经济学）、К·В·奥斯特罗维季诺夫（经济学）、И·А·特拉赫坦贝尔格（经济学）、С·Г·斯特鲁米林（经济学）、П·Ф·尤金（哲学）。经济学、哲学和法学学部的通讯院士有М·Т·约夫楚克（哲学）、М·Д·卡马里（哲学）、Ф·В·康斯坦丁诺夫（哲学）、В·С·科鲁科夫（哲学）、А·О·马克维尔斯基（哲学）、С·Л·鲁宾施坦（心理学）、П·Н·费多谢耶夫（哲学）、А·А·马克西莫夫（哲学），Г·Ф·亚历山大洛夫被选为该学部的秘书。历史学部院士有А·М·德波林。

至1981年1月，苏联科学院有院士234人，通讯院士498人，外籍院士80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院士37人，通讯院士73人，外籍院士7人。1981年12月，在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的例行选举中，在社会科学领域又增选了院士8人，通讯院士14人。

大学是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苏联科学院的发展历程一样，大学的有关系、所和学院也经历了建立、充实、调整和发展的过程。

首先，为改造旧大学，政府向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等著名大学委派红色教授学院的学者和毕业生，以充实教学和科研队伍。苏联从1925年开始培养研究生，设立副博士和博士学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院所约2000个，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研究人才。

其次，建立新式大学，培养党和政府的理论干部。1919年“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等共产主义大学建立，1921年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

第三，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调整，增加历史唯物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1934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决议，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恢复历史课教学。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恢复了历史系。

第四、苏维埃政权克服经济困难，逐渐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1939年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支出是165亿卢布，1940年达到220亿卢布。

第五、大力发展民族高等教育。在第一、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也非常迅速，初步建立了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在中亚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杜尚别等城市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和国内建立了一大批综合性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师范和艺术学院。最终达到每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除外）和自治共和国（部分州）一般设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师范学院、经济财政学院。

70年代初，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社会科学教育司司长普图林博士透露在苏联各高等学校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共有3万多人，其中51%的教师拥有副博士以上的学位。

苏共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所属的科研院、所是苏联人文社科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俄共（布）中央非常重视对十月革命经验和意义的研究，于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年12月，又成立了十月革命史和俄国共产党史料征集出版研究委员会，从1921年12月1日开始，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十月革命史及俄共史料征集委员会划归党中央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的部门。同时，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指示，派人在德国、法国、英国征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译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列宁去世后，为了纪念和研究列宁的思想，并且应广大党员的要求，俄共（布）中央于1924年5月



建立列宁主义研究院，1928年列宁主义研究院与十月革命史及俄共史料征集委员会合并，1931年11月又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成立了直属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研究院。

为了培养理论干部和反击资产阶级学者在理论上的进攻，根据列宁的建议，1921年在莫斯科建立红色教授学院，著名历史学家M·H·波克罗夫斯基为第一任院长。在苏维埃政权早期，这个学院不仅是重要的教学单位、高级专业干部的培养中心，而且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阵地。该学院直接从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招收学生。从1924年起开设经济、历史和哲学课程。1924—1925年，对历史课的教学计划做了重大变动，开设了俄国十月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课程。1924年7月，11名首批毕业生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社会教育科学院等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到1931年，红色教授学院培养了100多名历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И·И·明茨、А·В·舍斯塔科夫、А·М·潘克拉托娃等。1931年该学院的专业进行了重大调整，设立了农业、史学研究、党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苏联宪法和法律、世界经济和政治等八个专业部门。后来又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技术部。1938年该学院停办。

根据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1939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央高级党校，任务是培养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及科学工作者。党校设有13个教研室，开设联共（布）党史、苏联史、世界通史、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俄语和文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拥有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40年代，全苏开办了直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以推动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加强对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宣传，以调动全体人民的政治和劳动积极性。1957年1月，《苏共历史问题》出版，主办者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其任务是探讨党史问题，特别十月革命后的党史问题。

1978年，苏共中央决定将中央高级党校（1939年成立）、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44年成立）和中央函授高级党校合并为苏联中央社会科学院。该院成为苏联党政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教学和科研中心，1981年10月改组为“大规模的教学科研综合体”。除承担教学任务外，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紧迫问题”，共产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研究院设有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世界经济、哲学、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工人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新闻学、文艺学和科学无神论等专业。另外，还设有党政干部专业进修学院。各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均由相应的教研室负责，经院学术委员会批准，它有权授予副博士和博士学位。做为直属苏共中央的机构，研究院还负责协调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高级党校的科研工作。

此外，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也普遍建立了高级党校或研究学院，截止1981年共有15所。到70年代初，一个从中央到加盟共和国的党校和研究体系最终建立。1978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要求各级党校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党和政权建设、领导经济文化的紧迫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内成立高级党校校长理事会，来协调整个党校系统的教学、科研、出版工作。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范围的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苏联各届党政领导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再强调加速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同时，把积极发展国际间的科技合作作为苏联科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引进先进技术，利用世界各国的科技成就来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

通过经互会不断发展和加深同各国的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关系。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月，当时参加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次年，民主德国也加入了该组织。起初，经互会只限于欧洲国家参加，到了1962年，经互会章程作了若干修改，规定世界上任何愿意参加的国家都可加入。之后，蒙古于1962年，古巴于1972年，越南于1978年也参加了该组织，使经互会成了包括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共十个国家、人

口为 4.35 亿多边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1980 年，全苏各类各级科学院、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工作者近 140 万人，科学博士近 4 万名，副博士近 40 万名，科研人员中有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及资深专家 27000 人。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科学院的科研机构、设备以及科研人员绝大部分由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科学院于 1992 年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РАН）。1999 年 8 月，全俄罗斯各地隆重庆祝俄罗斯科学院建院 275 周年。

## 二、政府对学术研究工作的领导

苏维埃政权极为重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重视发挥政府在科学事业中的协调作用。根据列宁签发的法令，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一个科学技术研究部，吸收 250 名教授、300 名工程师和 240 名其他专家参加工作。1919 年 12 月 23 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改善科学家生活状况》的特别决定，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著名科学家发放国家特别配给的口粮和提供住房。

1922 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成立了特别临时科学委员会，1926 年建立了全苏科学工作促进委员会、科学院委员会和科学机构局。联共（布）中央也于 1926 年建立了学术、教学和出版管理委员会，由俄共（布）的红色理论家、著名文学评论家 A·B·卢那察尔斯基任主席，该委员会管理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苏联革命博物馆、东方学联合会等，1930 年苏联科学院也划归该委员会领导。这一行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党中央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1929 年 5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决议《关于加强科学工作的措施》，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由共产主义研究院领导的各马克思列宁科学研究所继续发展，并采取了更完善的组织形式，以便在各专门学术部门转入直接的科学研究工作。决议要求社会科学各研究机构工作的开展必须围绕着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同时警惕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予以坚决的反击。要求各级研究机构就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及发展前景广泛开展讨论，帮助党中央制定社会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这项决议宣布共产主义科学院做为全苏科研的“规划中心”，随后又宣布苏联科学院做为全苏的“最高科研中心”。

1929 年，全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导中心建立。1931 年 3 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从此，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走上苏联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指导，科学研究完全纳入计划经济的道路。联共（布）中央于 1935 年 8 月 25 日作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决议，要求该院加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加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

为奖励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作出优异成绩的科学家，苏联政府设立了各种荣誉称号和奖金。1925 年 6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设立了列宁奖金，在决议中强调：目的在于“鼓励科学活动朝着最接近列宁的思想的方向，也就是朝科学和生活紧密结合的方向前进”。除此外，还设有列宁勋章、斯大林奖金、红旗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等。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主持下，全苏掀起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浪潮。同年 10 月，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学部、历史学部、语言文学学部举行联席学术研讨会以庆祝苏联共产党成立 50 周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致开幕词。这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科学界召开的第一次学术大会，影响较大。涅斯米扬诺夫在会议上强调：“苏联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性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根除书呆子习气、教条主义和以引文的堆砌代替活生生的科学思想的企图。党要求铲除我们科学和宣传工作中占有地位的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作的不正确的、反马克思主义阐述，铲除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人个迷信。”

苏联政府在经济方面推行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权利的重大改革，在全国设立 105 个经济区，将原中央所属工业、农业部门的管理权力下放，同时也将苏联科学院的一些科研院所下放到经济区。但经过几年的尝试，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许多改革政策被迫收回，苏联政府对苏联科学院的管理体制也被迫做重大调整。1961 年 4 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关于改进全国科研工作的协调工作和改进苏联科学院活动的措施》，宣布在苏联部长会议之下设立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的管理工作。将改革时期下放到专业经济部门的原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划归科学院，并且宣布苏联科学院今后的研究方向是注重发展理论科学。苏联科学院作为全苏最高科研中心，其方针是领导主导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在规定的领域内开展有发展前景的科学工作，研究、概括世界科学成就，确保在学术和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实施有效的领导。其机构设置为：每两年召开一次的科学院全体会议及常设主席团，主席团向全体会议提交报告。苏联科学院分为数学物理学部、生物化学部和人文社会科学部，各部下设分部，分部下辖研究所、委员会、刊物编辑部和学术团体。此外，隶属主席团的机构还有各重大课题学术委员会、图书馆、“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部全苏促进联合会等。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继任的勃列日涅夫一方面表示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各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也宣布进行“纠偏”。在 1966 年召开的苏共 23 大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报告中强调：社会科学“它们的使命就是要全面地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形成过程的倾向和特点，国家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劳动经营的形式和方法，劳动的科学性的组织安排，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迫切的问题。”1967 年 8 月 14 日，苏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并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各项措施》。决议对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批评，要求社会科学必须彻底摆脱简单化、概念化、注释性和繁琐性的影响，防止背离历史主义原则和见风使舵的倾向。要求“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和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历史学、法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应该更加有效地和全面地研究巨大的理论问题。”决议提出有必要编写一些专讲党史的学术著作，深刻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程，研究列宁主义的精髓。同时，必须根据具体史实进行研究，防止对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的整个时期全盘否定。

70 年代后，世界各国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尖锐化并最终分裂，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内部分歧加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陷入“滞胀”的困境。面对这种新的新形势，苏共中央指出要重视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情况。苏共 24 大在决议中指出：“党一向把依据列宁的思想、方法论去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迫切问题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党应该更侧重于理论的发展，提高科学机关的工作水平，使社会科学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

70、80 年代，苏联社会科学家在国家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党的和政府的重要决议《确定新技术的经济效率的方法》《1990 年前苏联生产力布局的总方案》就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的。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为改善国民经济的管理水平，研制了一系列经济信息自动管理系统。同时社会科学家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明显也提高了。在 1981 年召开的苏共 26 大上选出的 537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具有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以上称号和副博士以上学位者约占四分之一，共 129 人，其中社会科学家 75 人。

80 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逐渐扩大，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热潮的影响下，一些科学家提出反思苏联 70 年发展历史，反思 70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填补因个人迷信、行政命令和有意回避而造成的学术研究上“历史空白点”。苏共中央对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曾在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提出：“整个说来，社会科学的情况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很遗憾，单调乏味、无聊地一再重复已有的真理、惧怕新的东西、教条主义等在社会科学中十分

普遍。”1986年8月，苏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的决议》，提出哲学界的任务包括：1、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辩证法。2、研究科技进步的社会哲学和方法论问题。3、研究社会发展中的因素。苏联领导人对社会科学界的批评，推动哲学家们的自我反思。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一时期，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活动和积极参与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而苏共中央的错误决定及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指示在此时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导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管理失控。

### 三、对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管理模式的评价

1、苏联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苏联人文社会科学家们在丰富人类文明财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创立社会主义科学体系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70年的发展历程，创立了世界学术史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有关学说和研究体系，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说，在充分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直接为巩固苏维埃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封建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它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生命力及战斗力，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提供了借鉴和教训。

2、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国家政治和党及政府的政策保持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着苏联共产党各个时期的纲领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影响。换一句话说，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从机构设置、课题研究和学术思想都具有极其明显的“国家性质”。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机构和组织高度集中，也造成了学术思想的高度集中。例如历史学和哲学即是政治，是党的方针和路线的反映，它们参与了苏联的历次政治斗争，并且因此而数次走入歧途。正如中国学者安启念在《苏联哲学70年》中评论说的：“70年的历史表明，苏联哲学与苏联政治是共进退、同荣辱的，离开二者的关系，苏联哲学的发展历史就难以解释。”

3、同苏联政治体制一样，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严重的老龄化、思想僵化和派别斗争的现象。许多著名科学家做为学术权威，享有极高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占据着苏联科学院的领导职务，长期没有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学术思想上压制和打击年轻一代科学家。苏共27大之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规定了担负科学组织工作职务的最大年龄界限，规定每年各研究所必须补充不少于该所总人数5%的青年干部，即是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和师承关系，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界门派林立，加上有些学者在学风和个人品德方面的缺乏，从而出现了一有适当政治气候，一派就倚重某领导人的批示和支持打击另一派，在学术上进行无情批判，在人身上施以残酷打击，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

4、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化和概念化的缺陷，学术研究与实际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翻开苏联学者的著作，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大段引用的领袖的讲话和语录，对苏联领导人和一些事件的过分的溢美之词，套话、套句、套段连篇，热衷于领导人的讲话做注解。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闭目塞听，热衷于就个别学术概念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热衷于单纯地从学术的角度构建某一理论框架，而回避尖锐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发展矛盾，不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及时地指出苏联社会发展的严重隐患。正如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所批评的：“整个说来，社会科学的情况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很遗憾，单调乏味、无聊地一再重复已有的真理、惧怕新的东西、教条主义等在社会主义科学中十分普遍。”一些学者缺乏为科学献身的骨气和学术上的道德自律，唯前人，唯上级，唯领导人的指示是从，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